

超越进化的发展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回眸与思考

景天魁

提要:“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本文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直观地刻画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描述了“进化”与“超越进化”在经验层次上的区别;进而在概念层次上阐述了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结合和统一,并由此论述了“十二五”时期之所以能够实现“超越进化的发展”的原因和机理。

关键词:“十二五” 新常态 超越进化 非西方发展经验

刚刚挥别的“十二五”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的5年,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5年。“十二五”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特殊意义在于经济发展发生了从旧常态向新常态的历史性转变。所谓新常态,主要特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相应地,社会发展包括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特点。

进入新常态面临着不少困难——经济下行压力、结构调整阵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部分经济风险显现,这些既是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表现,也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密切相关。面对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中国沉着应对,化挑战为机遇,主动适应新常态,适度调低增速,使之基本保持在合理区间,同时大力调整优化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从而有效引领新常态,确保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保持领先地位,而且社会稳定,各领域都取得了不凡成绩,但西方却有一些人跳将出来,重新鼓噪“中国崩溃论”。其实几十年来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眼看着中国一路攀升、经济总量一两年就超过一个发达国家,他们却硬着头皮一路唱衰。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他们虽然无奈,却不思更改,最近看到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又趁机老调重弹,而且不是完全没有市场,这就提示我们,其中除了偏见以外,必定另有根

源。我们要让世界读懂中国,不仅要摆事实,还要努力把道理讲透,做出更切合实际的解释,并能揭示更深层原因。本文拟从发展社会学角度对此做一尝试。

一、“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之所见:超越进化的发展

发展社会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然而,这个学科不是由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是由西方学者发起的。这一理论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冷战时期初启之际。“以现代化理论为核心的主流发展理论承袭了欧洲殖民时期的思想”(普雷斯顿,2011/2002),一些西方学者利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化”在含义上的相似性,把在当时已经是陈年旧货的社会进化论引为理论基础。其实,“进化”一词本来无非是强调渐进的、自然的演化,这是基本含义,亦称“本身义”。“社会进化”强调社会是一个一个阶段地、从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这是“进化”的“引申义”,其特点是用生物现象和规律比附社会现象和规律,尽管粗糙一些,但也并非绝对不可以。问题在于当社会进化论被引入发展社会学时,“社会进化”却被意识形态化了,附丽上了“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优越论”,使之变成了一种进化主义的社会思潮。由此,早期现代化理论把“现代社会”等同于西方社会,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这种所谓“进化”就连引申义都谈不上,只能称为“附会义”了。这种理论必然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西方社会的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惟西方模式独尊,亦步亦趋地重复西方社会走过的老路(景天魁主编,1997)。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建基于进化主义之上的现代化理论,不仅被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地区的实践经验所驳斥,而且在理论上也被超越了。

不过,一种观念一旦浸入了理论的基础层面,其影响是很难消除的。致使在发展社会学中,或明或暗地承认凡符合所谓“进化”的就是正常的、符合常规的,因而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即或一时表现靓丽也是要“崩溃”的。由于学术话语有所谓的先置效应,后来者即使不接受也必须“接着说”。故此,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探寻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新经验的理论解释,提出了“超越进化的发展”

概念(景天魁,1999)。显然,不论是“进化”还是“超越进化”都相当抽象,需要加以具体化,使之更为明确、更易于理解。恰好在“十二五”时期,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新举措,展现了新的“大逻辑”(习近平,2016),我们可以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看到超越进化的发展之更为鲜明的特征。基于这些经验事实,我们不仅可以对“进化”与“超越进化”的区别获得具体的理解,还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崩溃论”的悖谬。为了能简明而直观地对此加以说明,我在这里尝试采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因为数学语言是最为简洁明了的,当然这只是“借用”,并不是真正的“数学”。

(一)把减法做成加法

众所周知,我国以往30多年的高速发展,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成本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方式可以称为“把加法做成加法”,基本上是常规性的。转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淘汰过剩产能,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排放,关闭严重亏损企业,兼并重组僵尸企业,这些都是在做减法。确实,一些企业倒闭了、裁员了,而且规模还不算小,如果在其他国家,失业潮早就出现了,但我国失业率仍保持在5%以下,那些被裁掉的员工去哪里了?近几年,我国第二产业增长率大幅下降,外贸出口一蹶不振,如按“常理”,经济“硬着陆”在所难免,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低迷、微增长甚至负增长,而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在7%左右的合理区间,这是怎么做到的?

诀窍在于我们不是简单地做减法,不是一减了之,而是用做加法的办法做减法,减是为了加。

1. 产能转移。在一地减了,在另一地加了。转移就不是简单地做减法,其实是为了更大、更好、更均衡地发展。产业转移一是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二是“走出去”,向国外发展。

东部产业由于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受能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制约,环境承载空间有限,必须内迁,以释缓生产成本和环保成本增高所带来的压力。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恰如天降甘露,正是其加速发展的大好机遇(杨建国,2015)。自2010年《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十二五”期间产业转移北上西进形成高潮,先是豫、皖、晋、陕等省市,接着相继成立了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黄河金三角(跨山西、陕西、河南3省)等6个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姜小鱼,2014)。产业转移梯度推进,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速连年高于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从2004年的16.88%、14.07%上升到2013年的21.64%、19.33%;而东部地区则趁机加快产业创新升级,进而实现全国整体经济提质升级。

“走出去”也是“十二五”的一大亮点。在国内减了,在国外加了。化解过剩产能,不是简单地关门、下马、砸掉,而是变“减”为“加”,加快“走出去”,加大海外投资力度。2013年,我国对世界直接投资的净额达到1078亿美元,远远高于2007年的26.5亿美元。2014年中国的海外投资首次超过吸引外资的数量,这表明我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陈雪琴,2015)。当然,“走出去”并不就是为了化解过剩产能,更重要的是提升技术档次,创新品牌,增强国际竞争力。

2. 产业升级。该淘汰的产能减了,有发展前景的产能加了。2014年我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25%,在50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一些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中国核电的技术水平已经进入了世界第一阵营;目前,中国在运和在建的核电机组的数量分别为20多台,其中,在建核电机组数量位居世界第一(钱智民,2015)。中国的高铁建设被誉为“奇迹”,试验时的时速曾创下350公里、380公里乃至486公里的纪录,频频刷新世界纪录。“中国速度”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仅2015年国内高铁新增里程就达9000多公里,年增近万公里,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陈玥辛,2014)。截至2015年9月底,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8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3. 产业结构优化。第一产业稳步发展,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逐年提高,粮食产量实现“12连增”,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6%。工业结构继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服务业在2013年首次上升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4年占GDP比重48.2%,2015年突破50%。

4. 减少政府审批,减少企业税费,这个减本身就是加。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所谓的非行政许可,推动各级政府列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2015年提前实现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李克强,2015);约束政府权力,落实完善鼓励创新、创业

的税费减免。这些减法为企业发展腾出了很大空间,增强了企业和社会大众创新、创业的活力。

总之,为了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我们确实做了许多减法,但其实质主要是用做减法的办法做了加法,通过减起到了加的效果。

(二)把加法做成乘法

“十二五”时期,尽管 GDP 增速下降,但对教育、科技、健康的投入却逆势上扬。这些看起来都是在做加法,但大量研究证明,这三项投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乘数效应,其实做的是乘法。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必须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情况下,对这三项投入更加具有战略意义。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2010 - 2014 年,中国 GDP 增幅为 55.57%,而政府卫生支出增幅却高达 84.55%;研发(R&D)经费支出增幅高达 84.29%(政府资金与企业资金之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增幅 66.93%,其中每 10 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人数增幅达 13.66%。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政府社会事业支出的变动情况(2010 - 2014 年)

指标/年份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增幅(%)
中国 GDP(亿元)	408902.95	484123.50	534123.04	588018.76	636138.73	55.57
政府卫生支出(亿元)	5732.49	7464.18	8431.98	9545.81	10579.23	84.55
政府资金研发经费支出(亿元)	1696.30	1882.97	2221.39	2500.58	2636.08	55.40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亿元)	14670.067	18586.70	23147.57	24488.22	—	66.93*

说明:(1)* 因缺少 2014 年教育经费数据,此处增幅为 2010 - 2013 年数据的计算结果。
(2)数据的计算未考虑物价波动因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www.stats.gov.cn)。

在教育方面,2010 - 2015 年,从中央到地方大幅增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到 2015 年,学前 3 年毛入园率为 70.5%,小学净入学率为 99.8%,初中毛入学率为 103.5%,义务教育普及率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他指标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15.83%(刘奕

湛、吴晶,2015)。

根据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测算,从2010年起,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2010-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1.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分别提高了2.26和2.63个百分点。教育红利大大抵消了人口红利的下降(刘奕湛、吴晶,2015)。这些加法得到的乘数效应,总体表现是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比2010年成倍提高逾34%。

在科技发展方面,20世纪90年代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以下,此后不断增长,到2014年这一投入比上年增长12.4%,占比上升为2.09%,虽仍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但这一明显提高已经见到了可喜的回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称,中国主要靠复制西方产品引起关注的时期早已结束,2014年全球近1/3的专利申请来自中国(92.8万件),超过美国(57.9万件)和日本(32.6万件)(《瑞士商报》网站,2015)。2015年研发(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1%,科技经费投入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二,科技人员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4.9件(高鹏,2015)。

在医疗卫生方面,我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建设已取得长足进展,随着进一步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会更加明显改善。2014年人均预期寿命75.3岁,比2010年提高1.8岁。2014年,北京、上海的每千人口病床数和每千人口医师数都与纽约和伦敦不相上下,有的甚至大幅超出,例如北京的这两个指标都明显高于纽约(宋贵伦、鲍宗豪主编,2015)。当然,我国的地区之间差距较大,这是我们今后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乘数效应的因素当然不止上述三项。总的来说,加大各项民生投入不仅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国民素质、增进人民福祉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2014年国家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比例提高到70%以上,约在7、8年前,这一比例不过30%。2011-2014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大幅高于GDP增长速度。由

此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消费能力增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大,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66.4%。

(三)将点做成面

我们对于点面关系是很熟悉的,常常说到由点到面、以点带面。可实际生活中的点面与数学上的点面不同。数学上的点没有面积、面没有体积,点和面都是一种抽象概念,再小的面究竟是由多少个点组成的,是数不清的。实际工作中情况就不同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减少了6亿多贫困人口,这是很大的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扶贫采取的是面上突破的战略,扶贫单位是县级贫困区域,根据当时的人均收入,在全国中西部21个省区市确定了592个县(旗、市)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它们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和特困地区,重点县覆盖的贫困人口(年均625元)占全国的54%,低收入人口(年均865元)占57%。2001年转向15万个村级贫困区域;2011年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重点扶贫(唐任伍,2015)。这一时期的农村扶贫都是从面着手,没有精准到户。

这种面上着手的扶贫模式,既是以面“带”户,也是以面“代”户。所谓以面“带”户,是指政策和资金资源“大水漫灌”,相当一部分有脱贫能力的群体可以实现脱贫;但那些不适应同质性的扶贫政策,或是自身根本不具备脱贫能力的群体无法实现脱贫。所谓以面“代”户,是指在面上的平均数提高了,达到脱贫标准了,掩盖了那些并没有实现脱贫的困难户。这些困难户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经过多轮扶贫攻坚,目前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偏远山区,无论采取何种扶贫方式,难度都很大,而从面上着手的扶贫方式对于这部分困难群体来说,效率很低甚至难以奏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精准扶贫”就是从点着手;不是以面“带”户,而是以点促面;不是以面“代”户,而是以点成面——以“不容一个人掉队”来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这也就是要把点做成面。

所谓把点做成面,一是要像过去解决面上贫困问题一样,重视解决一家一户的问题,过去是一县一策、一片一策,现在要一人一策、一家一策,个别施策、特殊施策,此为“精准”。从贫困群众的诉求看,每家都有特殊性,“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且日益呈现多样化,因而不能

“一刀切”。困难群体往往有更多、更强烈的诉求,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扶。因此,扶持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确保各项政策落到扶贫对象身上。“精准”就是要吃透情况,对症下药、靶向治疗。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各不相同,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每一贫困户脱贫的禀赋、资源、机遇,以及返贫的可能性等都不尽相同,不能采取统一的扶贫办法,应当因地制宜、因人定策,灵活开展个性化扶贫(“学习笔记”小组,2015;唐任伍,2015)。二是要解决每人每户的贫困问题,每个“点”都达到小康标准后,再整合成“面”实现小康。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全县“面”上的平均数,可能平均数达到小康了,但一些贫困户并没有达到小康。由每个“点”的小康整合成的“面”上小康,才叫“全面小康”。

2011-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22亿人减少到7017万人,累计减贫5221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2.7%下降到7.2%。到2020年,要确保7000多万人全部如期脱贫,每年要减贫1200万人,任务非常艰巨(高鹏,2015)。惟有精准扶贫,把点做成面,才是制胜之道。

(四)将“微分”做成“积分”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我们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主要不是一个数量要求,而是要提质增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靠的是数千万计的“微创”、“微投”企业,可谓“微分”;形成的是众多的经济新增长点,可谓“积分”。奥秘就在于如何将“微分”做成“积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要自下而上地激发民间活力,在我国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高,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累积数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只有调整既有的就业模式和科技创新引导模式,才可能将他们的创新积极性与聪明才智充分激发出来,这就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

首先是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带动下,我国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2014年我国的研发经费支出13312亿元,国家安排了3997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129项“863”计划课题,支持设立大批创业投资企业、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等(张前荣,2015)。

其次是催生“双创”主体。有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10000家以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结构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高技术产业增速超过10%(张前荣,2015)。

第三是加快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线医疗、网络教育等蓬勃发展快速壮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第四是创新就业模式。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以创业带就业,建立面向人人的创业服务平台;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更加关注一线职工、农民工、困难职工等群体,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习近平,2015b)。

第五是改革投资体制,重视、支持有创新前景的民营企业。中国有约6000万家注册企业,其中约96%是民营企业,这些企业被称为“充斥着富有创造性力量的幼龙”,其中,民营工业企业的产出自2008年以来年均增长18%,高出第二产业年增长率2倍多。“十二五”期间,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达到2/3左右(沈丹琳编,2015)。

以上描述的加减关系、加乘关系、点面关系、“微”“积”关系,只是要直观地刻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越进化的发展”情形,以说明其与所谓“一般进化”的区别。无需赘言,这些关系体现在许多方面,不只有精准扶贫可以体现点面关系,也不仅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体现“微”“积”关系。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按照进化原理,减法就是减法,如果做成加法,就是错了;加法就是加法,如果做成乘法,也是错了;点就是点,面就是面,微分就是微分,积分就是积分。但是按照超越进化的原理,可以把减法做成加法,把加法做成乘法,把点做成面,把微分做成积分。经济社会发展要比一般数学运算法则复杂得多,其中的逻辑确实不像数学运算那么“常规”,超出“常规”的运算不一定是错的。当然,这里只是借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进化”与“超越进化”的区别,说明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不能再沿袭过去习惯了的那种简单地用增加投资、扩大产能之类的“加法”和类似的被视为“常规”的做法来刺激经济发展。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这盘大棋,必须探索更新的“大逻辑”。那么,这种超越进化何以能够发生?何以能够做成功?其机理是什么?

二、超越进化的发展:作为一种解释

要说明超越进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和机理,就必须明确超越进化的具体含义,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超越”?概括地说,所谓“超越进化”,一是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二是超越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三是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四是超越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二元对立,实现二者的结合和统一(景天魁,1999)。

(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结合和统一

如所周知,发展社会学的理论逻辑是二元对立的,首先就是将传统性与现代性对立起来,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这个过程就是现代性取代和清除传统性的过程,而且传统性清除得越彻底、越干净,现代化程度就越高;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传统因素的阻碍,因此,反传统就成了现代化的必然选项。这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基本上是屡试屡败,不仅未能给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往往造成政治动荡、社会撕裂,经济反而陷入停滞。只有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了,那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外在因素的作用。而且正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总结它们的成功经验时肯定了传统因素的作用,例如,亚洲“四小龙”、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成功经验,都证明各自国家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适应现代化并发生转型,还可以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基于这些非西方发展经验,所谓“超越进化”首先就是超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肯定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可以共存的,它们之间会有矛盾乃至冲突,但对传统因素不能一概否定,有一些因素直接就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还有一些可以实现创造性转化,不能绝对化,毋需前后取代。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具有可加和性的。

“十二五”期间,我们大力淘汰落后产能、压缩过剩产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但并没有把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简单对立起来,而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这是新旧叠代,而不是简单“替代”。2015年,传统钢铁企业经营业绩下滑,但钢铁电商却爆发式增长,这一年国内钢铁电商数量

已达 300 多家。互联网 + 的兴起正成为钢铁、水泥、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良好机遇。传统行业有望借助电商、大数据等手段优化运营模式,倒逼产业转型实现新的增长。智能制造将成为新旧产业交叉叠代的实现形式,2014 年中国以 54% 的增速成为工业机器人全球最大需求国。

没有传统制造业,互联网这个现代产业就是空中楼阁。可见,现代的东西并不是消灭传统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可加和性的。互联网 + 传统产业,就可以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传统产业并非等于落后产业,事实上,我国由于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传统产业的设备和技术水平并不低,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传统产业中已有的高新技术,发展高端制造业以及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新材料,推出新产品,创造新模式,做好基础性研究,以此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产业如此,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家庭养老曾被认为是比社会化养老落后的传统模式,孝道更是屡屡被批判的所谓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然而现在 90% 的老人愿意选择居家养老,孝道亦作为优秀文化而被提倡;家族企业也曾被当作落后制度而备受诟病,但事实证明许多家族企业有很强的适应和自我更新能力,它与现代企业制度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可以吸收融合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四合院、通幽曲径,农村的古宅民居、乡土风情,都可以为现代化增添光彩,应该倍加珍惜。

由上可见,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结合和统一所体现出来的可加和性,是上述将减法做成加法的原因和机理。

(二) 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结合和统一

按照二元对立的逻辑,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无法统一的。在经济转型期,要么“软着陆”,要么“硬着陆”;要么“腾飞”,要么“崩溃”,总要陷入“二元对立”,不能超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可以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或者说,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中国这样地区差距较大、情况千差万别的国度,强调这种统一尤为必要。

怎样实现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结合和统一?

首先是空间接续,充分发挥我国发展空间大、梯次多、后备足的优势。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

式转变,长期依赖劳动力比较优势和人口红利、依靠低端制造业规模的阶段已经结束,投资和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快速下滑,但中国经济并没有发生断崖式跌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在经济增长动力告急之时,恰好前几年高校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发挥了作用,每年有7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这比欧洲有些发达国家的总人口还多,仅2014年,研究生招生就达62.1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721.4万人,创新储备人才充足。这有力地促使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从数量性红利变成质量性红利,或者说,从“人口红利期”变成“教育红利期”(刘奕湛、吴晶,2015)。农民工退潮了,大学生就业高潮来了。大国回旋余地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所谓中国经济韧劲足、潜力大,正在于此。

其次是创新接续,充分发挥创新对于发展的乘数效应。非连续性表现为质的跃升、结构的优化,其对于量的增加具有乘数效应,效果就不再是一般的增长,而是在价值链上位置的提升,是品牌效应,做定价权的拥有者,成为相关标准的制定者而不是被管制者,充当国际秩序的参与者、改进者而不是旁观者、被动的接受者,这些效应,是经济实现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结合和统一的可靠保证。

如按《曾经的辉煌》一书中的说法,教育、科研、人才、民间经济活动自由和产能不断升级换代是成功的五大秘诀(弗里德曼、曼德鲍姆,2012)。这五大因素在我国或者已经具备,或者正在快速成长,而且我国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人才供给和创新驱动一波一波梯次推进的态势:2015年,上海市提出要在两个关键指标上达到国际较高水平,即“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6%,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7件”,后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近5倍。同时提出要在“民用航空发动机”、“脑科学与智能技术”、“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前沿科学技术实现突破,在产业链中打造“创新链”(杨雄,2015)。上海、深圳、北京等创新“龙头”在全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会形成空间和绩效成倍增大的扩散效应。而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升级,这不是连续性的量的积累,而是质的跳跃。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关键要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习近平,2015a)。

总之,我们靠空间接续、人才接续、创新接续,就可以实现中国发展

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结合和统一。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可乘积性的原因和基础。由上可以得出结论: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结合和统一所体现出来的可乘积性,是上述将加法做成乘法的原因和机理。

(三)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和统一

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是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尖锐问题,或则普遍主义,或则特殊主义,构成了发展问题上一个很难摆脱的怪圈。走向世界意味着接受普遍性的东西,但如果放弃了特殊性,普遍化的过程就可能走向反面,能否克服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绝对化偏执是发展的一大难题。一些现代化理论家更是把这一对立推向极端,凡不符合西方所谓普遍性的“公认”标准的,是制度就要推翻,是政权就要颠覆,是文化就要批判。这种用普遍性取代和消灭特殊性的“逻辑”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没有逻辑可言。

超常规、超越进化的发展也有符合普遍规律的一面,但必定要有特殊性的一面。其特殊性的一面是什么?如何将特殊性与普遍性结合起来?

首先,特殊性与普遍性本来就是相对的。在前面讨论的点面关系中,任何一个点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点与面是相互依存的,离开了点,面也就不存在了。点与面、特殊性与普遍性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村,一家一户是特殊的,村则带有普遍性;相对于县,村是特殊的,县则带有普遍性;相对于省,县是特殊的,省则带有普遍性,以此类推。点与面、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这种依存性、相对性、可转化性,构成了它们的可整合性。

其次,普遍性其实是一个客观指标,并不是出自某国的就具有普遍性,出自其他国家的就只有特殊性;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普遍的,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就是特殊的。中国的发展经验适合许多处于类似发展阶段国家的实际,他们愿意参考,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亚洲、非洲许多国家从中国发展中获得了启发,中国经验也就不胫而走,走遍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合作共赢理念不仅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符合发达国家的利益,只要不是抱有特殊偏见,许多国家都愿意接受。例如亚投行,许多发达国家积极参与,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偏见是限制不了这种普遍性的。

第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中都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区别只是

在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方式和状态。决定这种结合方式和状态的是利益的共同性和共识的达成。为什么在一个群体内部容易形成和接受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共同生活的需要使他们必须承认和遵守一些普遍性的价值尺度、行为规则，等等；这些普遍性的东西也就与他们各自的特殊性结合了。不管怎么说，特殊性与普遍性是可以整合，也必须整合的，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没有特殊性的普遍性实际上都是无法存在的。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和统一所体现出来的可整合性，是上述可以将点做成面的原因和机理。

(四)时空压缩与时空伸延的结合和统一

发展中国家要在时空压缩中开拓发展空间，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时间），也就是在压缩中求延伸，变时空压缩为时空延伸。但这种延伸不是西方式的强行扩张，而是互利共赢的共同发展。“这既是对时空压缩的超越，也是对时空伸延的超越”。因此，如果说时空压缩是一种社会发展结构，超越进化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的逻辑（景天魁主笔，2000）。

“一带一路”战略可谓是将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结合和统一的样板。中国把自己的发展成果与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分享，可以带给更多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的机会，也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了与中国合作不是“威胁”而是机遇。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刚一提出，国际产能合作就迅速发展。据统计，2014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1.12万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近三成。

“一带一路”有效化解了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和围堵图谋。海上搞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围堵中国，历史早就证明像中国这样的陆海兼备的大国是围堵不住的。可惜这些围堵者只考虑现实利益，缺乏历史感，或者无视历史，到头来透支国力，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习近平主席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指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而不是‘交而恶’，彼此要多拆墙、少筑墙”（习近平，2016）。“通”就是物流通、资金通、人才通、文化通、心灵通。在国内发展中依靠这些“通”，数以千万计的小微创新企业可以积聚成引领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在国际发展中依靠这些“通”，可以形成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

“通”就是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的可贯通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实现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相结合和统一的根本举措，而其中所体

现出来的可贯通性,是前述将“微分”做成“积分”的原因和机理。

总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可加和性、可乘积性、可整合性、可贯通性,是超越进化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原因和根据。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强、可回旋余地大的内在机理。

如果再进一步深究,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可加和性、可乘积性、可整合性、可贯通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其根源何在?那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由历史积淀和现实创造的那些最稳固的基础性因素。

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要奔向现代化,从哪里出发?“从零出发”,这在体育比赛中是可以做到的,比分牌一下子就翻过去了。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从零出发”是不可能的。许多前辈企图“从零出发”都失败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结果一打再打而不倒,有些“打手”自己反而倒了;“文革”时有人喊“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自己却被历史荡涤了。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国家,现代化要从历史基础出发。历史就是发展的根基,就是实现现代化的本钱。

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也有人说中国人最有智慧。不论怎么说,几乎在不经意间,中国人创造了最为辉煌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可道而不可道的中国精神。这一文明和精神滋养的中国人,既是芸芸众生,又是万里长城;既有太极之阴柔,又有铁血之阳刚。不管如何褒贬,中国的现代化总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化”的;中国精神总是创造和维系了有资料显示至少在 1000 多年间经济总量雄踞世界第一的泱泱大国。必须要高度重视的是,中国人取得这些历史成就的逻辑,不是社会进化论,而是超越进化——超越天人对立、超越人神对立、超越邦国对立、超越家国对立、超越身心对立,崇尚和追求身心和美、家国一体、邦国和睦、人神相通、天人合一,最终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些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根本特质的集中体现。

中国历史、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这些对我们来说最为常见、最为普通、也最为基础,却因最常见而容易视而不见,因为最普通而容易不珍视,因为最基础而不加爱护。这些对西方人来说,可能最为陌生、最为隔膜、最不容易理解,他们很可能因为陌生而误读,因为隔膜而误解,因为不容易理解而不予理解。然而,如果说到“比较优势”,中国历史、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是我们最大的也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说到“超越进化”,这些就是最深厚的原因和动力;如果说到“十二五”的成就,这些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根源和理由。中华民族

必定实现伟大复兴的最深厚的根源,其实最终就靠这些最为基础的因素——中国历史、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这些基础性因素一旦遇到阳光雨露——有利的时代机遇、有力的政治动员、合理的制度环境、自由的发展空间,其复兴的势头就不可阻挡,即使遇到了阻挡,也会像长江、黄河那样,顶多拐个弯,调整一下脚步,总归是“奔腾到海不复回”。

中国历史、中国人、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是前述经济和社会超越进化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可加和性、可乘积性、可整合性、可贯通性的深厚根源和坚实基础。

三、结 语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在应对新常态还是在更长远的发展过程中,正如把减法做成加法、把加法做成乘法、把点做成面、把“微分”做成“积分”,比起常规的数学运算来更有做错的危险一样,超越进化比起自然进化和所谓“一般进化”,不仅有很大风险,而且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既然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那么做什么能够没有风险?既然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怎么可能有困难的道路?我们除了勇于面对风险,在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不怕挫折,宽容失败,一往无前,此外别无选择。

参考文献:

- 艾森斯塔德, S. N., 2006,《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三联书店。
- 陈雪琴, 2015,《我国产业转移现状和特点分析》,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报告(2月28日)。
- 陈玥辛, 2014,《中国高铁水平世界第一》,《长江商报》12月15日。
- 弗里德曼, 托马斯·迈克尔·曼德鲍姆, 2012,《曾经的辉煌》,何帆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高鹏, 2015,《“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展望》,光明网(http://guancha.gmw.cn/2015-10/27/content_17497540.htm)。
- 姜小鱼, 2014,《东部部分产业为何须向中西部转移?》,中国经营网(<http://www.cb.com.cn/index.php?a=show&all&c=mobile&catid=20&id=1068441&m=content>)6月26日。
- 景天魁, 1999,《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第6期。
- 景天魁、邓万春、何健, 2011,《发展社会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土, 2012,《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景天魁主笔,2000,《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学》,北京:学习出版社。
- 景天魁主编,1997,《中国社会发展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李克强,2015,《本届政府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实现》,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305/c1003-26641938.html>)。
- 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5,《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奕湛、吴晶,2015,《中国教育的崭新跨越——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综述》,《参考消息》12月24日。
- 普雷斯顿,彼得·华莱士,2011/2002,《发展理论导论》,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钱智民,2015,《中国核电的技术水平已经进入了世界第一阵营》,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12/09/155349khr2.shtml>)。
- 《瑞士商报》网站,201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称,中国成世界“专利冠军”》,《参考消息》(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6/c_128536493.htm)。
- 沈丹琳编,2015,《〈经济学人〉中国商业特别报道撷英(续)》,《参考消息》10月13日。
- 宋贵伦、鲍宗豪主编,2015,《中国社会建设报告(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唐斓,2016,《习近平眼中的民生短板有哪些?》,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9/c_128638308.htm)。
- 唐任伍,2015,《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人民网-人民论坛(<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5/10/21/c40531-27723431.html>)。
- 习近平,2014,《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闭幕辞》(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11月12日)。
- ,2015a,《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06/c_1114549235.htm)。
- ,2015b,《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8/c_1115119860.htm)。
- ,2016,《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光明日报》1月19日。
- “学习笔记”小组,2015,《关于“精准扶贫”,你需要了解的十个关键点》,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laigao/ycjx/2015-10/20/c_1116879999.htm)。
- 杨建国,2015,《“一带一路”机遇下的中西部产业突围》,凤凰智慧产业(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522/13725326_0.shtml)。
- 杨雄,2015,《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新民晚报》1月25日。
- 张前荣,2015,《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点燃经济增长新引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money.163.com/15/0526/04/AQGV8H7F00253B0H.html-26>)。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张志敏